

# “2014 中欧文化高峰论坛：迈向 后 2015 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综述

莫 伟

2014 年 11 月 27 日,由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欧盟委员会发展与合作总司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院承办,中国城市经济学会、马德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协办的“2014 中欧文化高峰论坛:迈向后 2015 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行。中欧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齐聚论坛,围绕“后 2015 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中欧新型城镇化道路”和“中欧城市文化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见了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委员内文·米米察(Neven Mimica)、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等中欧主要与会代表,并与他们就中欧文化交流与合作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

## 主题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主持了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和欧盟

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委员内文·米米察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陈奎元和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出席了闭幕式。

王伟光院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从 2009 年创办以来已是第四届了,该论坛过去为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平等对话、互惠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作出了独有的贡献,这次又首次在文化高峰论坛上为中欧的地方政府搭建了对话平台,围绕中欧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等进行借鉴与比较,为中欧务实合作开启了新的途径。王伟光认为,“迈向后 2015 的可持续发展世界”这个主题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和欧盟都是联合国“后 2015 发展议程”的重要启动者,双方在 2013 年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形成共识,将携手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各种努力。目前,联合国已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设定为

“后 2015 发展议程”的三大支柱,把 21 世纪的世界建设成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这不仅符合中欧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如何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已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大问题。中欧的专家学者、思想家和智库围绕这个大问题展开跨越各自文化屏障的对话、研究和争论,不仅有助于加深中欧思想文化艺术界之间的了解、理解,看到彼此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视角、不同方法,而且将有助于中欧人民的互相理解与尊重,超越各种傲慢与偏见,获得面向人类、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新知识和新智慧。

内文·米米察委员强调,联合国依据 2000 年《千年宣言》而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MDG)给全世界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米米察对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在很多领域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预计到 2015 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要比 1990 年减少一半,中国的贡献率将会达到 80%。米米察表达了对“后 2015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展望。他认为,联合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同时,面对“后 2015 可持续发展”这个大目标,欧盟也应该承担下述责任:一是继续对最需要的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二是要继续推动政策制定的一致性;三是继续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当今社会面临一系列关键的挑战,自然资源拥有率在减少,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和生物多样性都受到了威胁,气候变化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欧盟也期待着中国和所有相关方一起努力,共同实现“后 2015 可持续发展”目标。

### 后 2015 可持续发展

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彭小枫认为,中国和欧盟都是“后 2015 发展议程”的重要启动者,经济、社会、环境这三大领域能否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着我们能否继续承载已有的历史,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走向,也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关系着全人类的未来。欧洲对外行动署多边关系与全球事务主任斯蒂芬·奥尔(Stephan Auer)认为,中欧之间有很多的相同点,也有很多共识,我们需要进行合作,共同面对“后 2015 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他认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框架,欧盟将致力于在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然而“千年发展目标”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后 2015 年发展议程”将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的可持续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中欧双方能够发挥世界 50%的人口的潜力,将有助于实现“后 2015 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持经济增长,是实现“后 2015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归纳总结了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他强调,2010 年之前,中国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表现为劳动人

口比重迅速提高,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人口变化的逆转发生在 2010 年。按照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 15 岁到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到达最高值,2010 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人口抚养比提高了。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转变的过程,人口红利不再支撑中国经济以两位数速度增长,但是改革红利可以保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合理适度的经济增长。

比利时欧洲学院马达里亚加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德福安(Pierre Defraigne)认为,尽管欧洲已经高度发达,但欧洲各个国家发展情况也不一样。目前欧洲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后续影响,正面临经济长期低增长的局面。欧洲要想重振经济,必须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包括债务危机等。欧元集团学会(Eurogroup Institute)主席埃维·于文(Herve Juvin)认为,目前很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指标受到了大公司、大企业的影响。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新的指标,这些指标必须要同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特凡·德尔康(Stefan Dercon)教授提出,“发展式减贫”是一种新思维、新路径,不是仅仅依赖官方的援助手段。中国在这方面尤其成功,亚洲很多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在减贫。这种方式使人们能够得到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有助于脱贫,这也是经济增长的模式。他认为,中国如果能

够加大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话,会带来长期的好处。中国除了投资之外也可以转移制造业的能力给这些贫穷的国家,帮助非洲和其他贫穷国家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就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很多贫穷国家来说极具吸引力,这并不是干预,而是加强合作。中国和这些国家合作,不仅可以提供资金进行援助,也可以帮助他们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更加有效的国家能力建设。法国高等商学院教授班那帝·法塔维诺(Benedicte Faivre-Tavignot)通过研究发现,依靠政府和慈善机构帮助减贫已不是唯一的方式,必须要有包容性发展。她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够带来可持续发展,但是经济增长如果是一种包容性增长的话,就一定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她指出,私营部门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应该为贫困人口提供服务,因为处在“金字塔”低端的人恰恰最具有增长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黄晓勇提出,中欧在为非洲减贫的领域内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一是欧洲与非洲有广泛的经济联系、文化联系;中国与非洲也有传统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如果中国跟欧洲更紧密地合作起来,共同推动非洲的发展,这将是非洲的福音。二是中欧合作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言,减贫并不是它的全部过程和全部结果,它还要走向生活更加富裕的未来。三是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经验、一种借鉴,它丰富了人

类的发展模式,丰富了人类发展的道路,因为全世界并不存在每个国家都通用的一种发展道路。在各个国家的交流和学习中,各个国家彼此发挥优势和长处,结合自己的特点,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正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以及联合国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总裁林健等认为,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按照两个大的领域来划分:一个是社会保障;另一个是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社会政策对国家发展的意义重大,无论是对于改善生活质量、提升人力资本,还是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减少贫困,都非常重要。中国的社会政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挑战和问题都还很多。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还需要深化国际合作,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到现阶段,人们普遍都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因此,今后的政策要从认识到行动统一起来。首先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其次,从需求层面来看,很多环境问题是因现代社会的无效需求过多,减少无效需求和浪费,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再次,从供给来说,要减少污染、减少碳排放,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最后,从政策层面来看,最重要的是行动。中国政府已经强调了很多年关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

设目标。中国的体制特点是一旦决定了就行动得快,也尽可能地做好。在环境方面,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社会各方面要大力推动。另外,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南南合作问题也很重要,中国有很多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具有更切合实际的参考价值。

### 新型城镇化道路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战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全球视角下的问题。2008年全球结构性经济危机后,新型城镇化逐渐成为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新型城镇化问题上,中国应和欧洲国家相互借鉴,学习经验,积极开展合作,使整个世界的发展成为绿色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包容性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新型城镇化不能只是造城,还必须和产业发展同步。要把城市发展起来,形成城市群,把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攻方向。中国城市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晋保平认为,继工业化之后,城镇化高速发展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中国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果,相关问题也逐步凸显,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等。欧洲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早,城镇化水平较高,在推进和治理城镇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认为,城镇化在欧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19 世纪以城乡分离为特征,而且城市里出现了贫富分化;20 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卫星城,但功能分化造成了资源紧张和浪费;现在正在经历重组和再造,在原来的城市空间无法物理扩大的条件下让功能累加、重叠,融工作、服务、休闲、交通、养老和环保于一个社区空间中。

兰州市副市长牛向东认为,面对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新趋势,我们要保护好家园,实现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正在协同推进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积极化解成长的烦恼,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又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兰州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生态环境、产业结构、气候特殊、水资源保护等多重制约因素。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建设生态宜居城市,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指出,徐州是中国城镇化一个试点,它把城市和周边的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城市规划的时候统筹考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认为,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一个主要形态和发展方向。欧洲的荷兰兰斯塔德城市群,就是围绕“绿心”来建成,这些“绿心”都是地洼和农田,周围是一些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城市就围绕在其周围。中国也有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包括南京、宁波等城市,目前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

群也是一大亮点。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安蒙认为,古村落与城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古村落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遗产资源。镇、城源于村落,而村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它自然就步入了城镇化的进程。

法国高等商学院教授班那帝·法塔维诺认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紧迫的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环境性能的优化组合,这将使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空气、水、土壤等,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顺利转型。其次,优化社会方面的性能,为人们创造就业和住房条件,使城市变得更有竞争力。再次,治理也非常重要,这需要由政府组织不同利益相关方来共同打造,并确保市民能够积极参与城市治理。最后,一定要融入地方的特点,包括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特点。这些具有人性化的措施能够帮助我们打造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环境,它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关注重点。

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彭小枫认为,从大历史观来看,人类文明总是在融通中成长,在成长中融通;在交流中发展、在发展中交流。16 世纪后期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绘画和音乐等方面著作介绍给中国,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介绍给西方,将中国文明引向了世界,也将西方文明引入了中国,从而成为中欧文化交流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先驱。因此,中欧文明的融通、文化的互建不应被看作解决现有问题的临时途径,更不

应被看作地缘政治的短暂结合。这是中欧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趋势。对于城市文化的表现形式,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认为,物质的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生存密切相关;而另外一部分与我们的文化、精神世界相关,只有两者交融的时候,才能获得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也是相辅相成的。城市文化,是视觉的文化形态,也是中欧之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话题。城市文化的第一个象征是文化建筑。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现代文化建筑上有着不同的路径。欧洲各国对文化建筑都非常重视。这些文化建筑成为都市非常重要的表征,也成为一种不断吸收传统和最新科技的结合体。在中国,随着各种博物馆、剧场、公共文化空间需求的不断增加,各个城市也努力把文化建筑作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象征物来进行构建。在这方面,中欧之间有很多可互相交流、借鉴和学习的方面。

埃维·于文认为,目前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危险和威胁之一,就是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而现有的经济发展可能正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不能基于同一个制度和同一种模式,只能基于多样性。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应该保护社会文化以及环境领域中人的权利。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框架、维护自己的治理体系和维持自己的价值系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认为,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保护应基于文化基础的特性,将城市的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要继续把跨文化的理念,用具体的行动体现出来,让大家都能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让跨文化对话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具体展开、逐步深化。

(责任编辑:张海洋)